

序 论

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

人类全体文化，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，我国所产者，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，皆无逊色。虽然，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，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。故如希伯来人、印度人之超现世之热烈宗教观念，我无有也；如希腊人、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，我虽有之而不昌；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，我益微不足道。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？曰能。中国学术，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，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。以今语道之，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。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，未尝不归结于此点。坐是之故，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，往往有独到之处，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。吾

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。

人生哲学，不在本讲义范围中，且置勿论。专言政治哲学，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，学术勃兴，而所谓“百家言”者，盖罔不归宿于政治。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：曰世界主义，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，曰社会主义。此三种主义之内容，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，孰优孰劣，此属别问题。要之此三种主义，为我国人夙所信仰。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，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。此三种主义，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，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。此吾所不憚昌言也。

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，国家主义萌茁发展，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。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？欧洲国家，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形。一切政治论，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。此种组织，以向内团结、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。其极也，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。国家主义之苗，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，而日趋蕃硕。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机隍不安之象乃愈著。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，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。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，故目的在平天下，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“天下”之一阶段。政治之为物，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。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，故向内之特别团结，亦不甚感其必要。就此点论，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，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可。无论为不好或不能，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，则甚章章也。此种“反国家主义”或“超国家主义”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，政

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。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，得失盖参半。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，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，是其得也。最后总决算，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。盖其结果常增加“中国人”之组成分子，而其所谓“天下”之内容，日益扩大也。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，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。盖此之由，虽然此在过去为然耳，降及近世，而怀抱此种观念之中国人，遂一败涂地。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，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，而此百数十年，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。吾人逆潮以泳，几灭顶焉。吾人当创钜痛深之余，曷尝不窃窃致怨于先民之诒我戚。然而平陂往复，理有固然。自今以往，凡畴昔当阳称尊之学说，皆待一一鞠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。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——即平天下主义、世界主义、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——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，正未易言。

罗素所著爱国功过一书，言“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的卑劣手段，以奖励其国民爱国心。最初仇西班牙人，继则仇法国人，继则仇德国人，今后又不知当仇谁氏。”此言深可味。

其所谓天下者，是否即天下且勿论，要之其著眼恒在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。

平等与自由，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。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，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。然而按诸实际，殊不尔尔，除却元首一人以外，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

平等。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，乃至并元首地位，亦不认为先天特权，而常以人民所归向所安习为条件。此种理想，吾先民二千年前，夙所倡导，久已深入人心。公认为天经地义，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，演成政治原则，莫之敢犯。其最显著者，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，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。其余烬之一部分，迄今犹在。我国则此种秕制，已成二千年僵石。欧人所谓“人权”，全由阶级斗争产来。其得之也艰，故其爱护之也力。我国则反是，斯固然矣。然必有阶级然后有斗争之主体。在久无阶级之我国，兹事自不能成问题，且以学理衡之，吾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。若果尔者，一切阶级灭尽之后，人类政治岂不日陷于堕落耶？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惨酷之斗争，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，纵不必自豪，亦未足云辱也。所以能尔者，则以人类平等观念，久已成为公共信条，虽有强者，莫敢屡撓也。

自由与干涉对待，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，在我国先秦时代，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。结果不干涉主义，殆占全胜。此主义以不可抗的权威，常临乎历代君相之上。故秦汉以降，我国一般人民所享自由权，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，殆远过之。事实具在，不可诬也。其间昏主淫威，墨吏孰法，致自由失所保障者，史固不绝书。然吏之毒民，非法律所许，民本有控诉之余地。至对于暴君，则自昔圣贤，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，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。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，故虽在乱离时，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，尚不致大受戕贼。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，盖此之由。

美林肯之言政治也，标三介词以概括之曰：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and For the people，译言政为民政，政以为民，政由民出也。我国学说，于 Of, for, 之义，盖详哉言之，独于 By 义则概乎未之有闻。申言之，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，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。此二义者，我先民见之甚明，信之甚笃。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，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，夫徒言民为邦本，政在养民，而政之所从出，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。此种无参政权之民本主义，为效几何？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，毋乃在是。虽然，所谓政由民出者，不难于其理论也而难于其方法。希腊诸市之全民会议，遂得谓为真 By the people 耶？近世诸国通行之代表制多数取决制，乃至最近试验之苏维埃制，又得谓为真 By the people 耶？皆不容无疑，然则实现 By the people 主义之方法，虽在欧美今日，犹不能作圆满解答，况我国过去之国情——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——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。既不能得有可恃之方法，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，亦固其所。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，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，行民本主义之精神。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，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。故虽累经专制摧残，而精神不能磨灭。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，辄疑为无源之水，非知言也。

文化演进较深之国，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，此通义也。我国盖自春秋以前，已注重此点。“既富方谷”、“资富能训”诸义，群经既所屡言。后此诸家政论，罔不致谨于是。而其最大特色，则我国之生计学说，常以分配论为首位，而生产

论乃在次位也。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，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。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，其所论列，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。在此主义之下，而实行方法大相逖庭，亦与现代社会之派别多歧者略相似。汉唐以降之实际的政治，其为人所称道者，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，而常以裁抑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。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，世界古今诸国中，盖罕能与我并者。此虽半由环境所构成，抑亦学说之入人深也。

中国未受工业革命之影响，故分配以情力而保平均。似不能持以与今代欧美比较，然中国百年前之经济组织，与欧洲百年前亦迥不同。我则一向皆常能保均富而抑兼并，此根本特色也。

窃尝论之，中国文明，产生于大平原。其民族器度伟大，有广纳众流之概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，同时并起，能并育而不相害。其人又极富于弹性，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，能巧于运用，调和焉以冶诸一炉。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，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，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，自有其不朽之位置。可断言也，夫绝对之真理之有无，学者久已疑之，理论上且有然。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，其是非盖益幻赜而不易究诘。欧洲近一二百年，政治学说、生计学说之标新领异，几使人应接不暇。种种学说，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。然每一主义之昌，未尝不有极大之

流弊踵乎其后，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。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，悉根本摇动。欲舍其旧而新是谋，则皇皇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。我先民所治我之思想，虽或未成熟，或久中断，搜剔而磨洗之，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。由此言之，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。

中国国民性之短处亦自有之，如好调和以致不彻底，即其一也。此非本论范围，故不多及。

平心论之，价值之为物，本非绝对的不变的。吾侪殊不必妄自尊大，谓吾所有者必有以愈于人，更不宜讳疾忌医，掩护其所短以自窒进步。但尤有一义当知者，本国人对于本国政治思想，不惟其优良者有研究价值，即其羸劣者亦有研究价值。盖现代社会，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。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，半缘制度，半缘思想，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。过去思想，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，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。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，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，断不能有效。质言之，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，则不能一日存在。近二十年来，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，一制度不效，又顾而之他，若立宪，若共和，若联邦，若苏维埃……凡人所曾行者，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。然而名实相缪，治丝愈棼，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，譬犹掇邻圃之繁花，施吾家之老干，其不能荣育宜也。最近穷而思返，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，虽然，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，欲

革去一旧思想，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履人心者以代之，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，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情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。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——据吾所确信者，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，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濬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。信如是也，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，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，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，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。

业字为佛教术语，个人遗传性谓之别业，社会遗传性谓之共业。

积极要求者，以国民意识积极的作用创造一种新组织也，例如法国之“人权宣言”为十九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。消极承诺者，以国民意识消极的作用，维持一种旧组织者也，例如日本今尚戴万世一系之天皇。中国人民默许藩镇割据。

第二章 问题之内容及资料

政治思想之内容，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，可分为二类：一曰纯理，二曰应用。纯理者，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，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，施政当采何种方针……等等。应用者，从实际上校其效率，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……等等如何始能实现。此两者虽有区别，然常为连锁的关系。纯理必藉应用而始圆满，应用必以纯理为其基据。

从能表现之主格观察，亦可分为二类：一曰个人的思想，二曰时代的思想。个人的思想，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，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；时代的思想，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，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。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，个人能开拓时代，时代亦孕育个人。

吾侪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，其资料当求诸何处耶？以吾所见，区为四类：

第一类，学者之著述及言论。此为个人创造力之完全表现，例如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庄子、尹文、孟子、荀卿、韩非、贾谊、董仲舒、仲长统、桓宽、司马迁、杜佑、司马光、郑樵、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、戴震、谭嗣同等，皆有著述传后。吾侪将其著述爬梳整理，可以察其思想之脉络焉。此外或无著述或虽有而已佚者，则从别人所徵引彼之言论以窥其思想之一斑。此惟先秦时代为较多，例如邓析思想，见于《吕氏春秋》；许行思想，见于《孟子》；惠施思想，见于《庄子》；宋钘思想，见于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之类是也。

第二类，政治家活动之遗迹。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，哲学思想为学者所独有，其发表之形式专恃著述，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的接触，一有机会，则不惟坐而言，直将起而行。故凡属有主张有设施之政治家，例如周公、管仲、子产、孔子、商鞅、李斯、汉高祖、汉武帝、王莽、诸葛亮、崔浩、苏绰、唐太宗、刘晏、陆贽、王安石、明太祖、张居正、清圣祖、曾国藩之流，无论其人为贤为不肖，其事业为成为败，要之其关于政治上之设施，皆其思想之现于实者也。故此等人之传记，实

斯学主要资料之一种。

第三类，法典及其他制度。政治思想之实现，恒结晶以变为成文之法典及其他单行制度，例如周官、法经、汉律、汉官、唐律、唐开元礼、元典章、明会典、清律例、清会典乃至如通典、文献通考等类之政书与夫历代诏令奏议凡此类法制之书，虽大半递相沿袭，而其间有所损益，恒必与其时代之要求相应，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。至于立法时赞成反对之意见表于言论者，尤足为时代思想之徽帜，自无待言。

第四类，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。凡思想皆应时代之要求而发生，不察其过去及当时之社会状况，则无以见思想之来源。凡一思想之传播，影响必及于社会，不察其后此之社会状况，则无以定思想之评价。故欲治政治思想史，必须对于政治史、经济史、宗教史、风俗史等有相当之准备，然后其研究不至歧误。又各时代中一般人指学者及政治家以外之人之言论，往往有单辞片语，优足为当时多数人意识之代表，非博观而约取之，不足以覘时代思想之全内容。此种资料，既无完善之成书可供采择，则亦惟泛，求诸群籍而已。

右四类，前二类为研究个人思想之资料；后二类为研究时代思想之资料；其实两者有交光的关系既如前述，则此种界限，殊无取细分也。以吾所见，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资料，可谓极丰富，独惜散在群籍，非费极大之劳力，不能搜集完备，且非有锐敏的观察力，时复交臂失之。此则凡治国故者所共感之苦痛，不徒本问题为然耳。

资料审择，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，因古来伪书甚多，

若不细加甄别，必致滥引而失真。例如以《内经》为黄帝思想，以《阴符》为太公思想，以《周礼》为周公思想，以《论语》孔丛子所记为孔子思想，以《列子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鬼谷子》等书各为其本人思想，乃至以伪古文《尚书》为三代时思想，杂讖纬诸书为邃古时思想，如是必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，而史之作用全失。

不惟伪书而已，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，亦当分别观之。盖古代著述家，每将其理想托诸古人以自重。孟子称“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。”岂惟许行，实亦可谓有为尧舜之言者孔丘、孟轲；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；有为黄帝之言者庄周也。故虽以此等大哲之著书确实可信者，其所述先代之事迹及言论，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，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。又不惟专家著述为然，即诸经诸史中资料，亦当加审慎。孟子论治诗也，谓当“不以辞害意。”其论治书也，谓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”盖史迹由后人追述，如水经沙滤，必变其质。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诂荡之辞，失真愈甚。吾侪既不能吐弃此等书以孤求史迹，而其所记载又玉石混淆，则惟有参徵他种资料，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，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。此则治一般史之通例，其方法非本书所能胪述也。

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云：“孔子墨子同道尧舜，而趋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舜。尧舜不可复生，谁与辩儒墨之诚乎？”此语最能道出先秦诸子托古之真相。

辨别伪书，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，不能因其伪而遂行抛弃。例如谓《管子》为管仲作，《商君书》为商鞅作，则诚伪也。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，则为绝好资料。谓《周礼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，则诚伪也。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，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，则固可宝也。又如《内经》决非黄帝时代书，自无待言，然其书实战国末阴阳家言所荟萃，阴阳家如邹衍之徒著述已佚，此书即其绝好之代表品也。《列子》非列御寇作而为晋人伪撰，亦略有定评，然晋人学说，传今无几，即以此书观当时时代意识之一斑，计亦良得也。

尤有一类资料决当拣弃者。汉代策问郡国所贡士，已开奖借空言之渐，唐宋以还，斯风弥扇。如韩愈、杜牧及苏洵、轼、辙父子兄弟之徒，多以好为肤廓之政论，滥博盛名。明清末流，帖括播毒，谈政本必“危微精一”，论政制必“封建井田”，尘土羹饭屡嚼而秽不惭，优孟衣冠久假而归无日。凡兹谰言，概宜芟汰。要之学者之学说，当以有无创造力为价值标准；政治家之绩业，当以有无责任心为价值标准。合此标准，可以厕诸思想之林，否则毋愿我为也。

第三章 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

研究法有三种：第一，问题的研究法。先将所欲研究之事项划出范围，拟定若干题目，每个题目，皆上下古今以观其变迁。其总问题，例如“国家起源”、“政府组织”……等等，其

分问题例如“土地宜公有抑私有”“封建为利为弊”“刑罚宜取惩报主义抑取感化主义”……等等。研究某时代对于本问题之趋势何如，某学者对于本问题之态度何如，以类相次，一题毕乃及他题。此法长处，能令吾侪对于各种重要问题，得有致密正确的知识，而且最适于实地应用。其短处，在时代隔断，不易看出思想变化之总因间因，且各问题相互之关系，亦不明了。

第二，时代的研究法。此法按时代先后顺序研究，例如先三代次春秋次战国次秦汉……等。在同一时代中，又以思想家出生之早晚为次。例如春秋战国间，先老子次孔子次墨子次商君、庄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韩非……等。此法长处，能使思想进化之迹历历明白，又可以将各时代之背景——即政治实况及社会实况——委细说明，以观思想发生之动机。其短处，则同一时代中或资料太多，对于各问题难于详细叙述，若勉强叙述之，则易时所述，与前犯复，令读者生厌。又一派之学说先辈与后辈年代隔离，例如孔子与孟子、孟子与荀卿令读者迷其脉络所在。

第三，宗派的研究法。此法将各种思想抽出其特色，分为若干派。例如儒家思想，自孔子起，继以七子后学者，继以孟子、荀卿、董仲舒……等等。法家思想，自管仲、子产起，次至商鞅、韩非……乃至末流之晁错、诸葛亮等等，以类论次。此法长处，对于一学派之思想渊源——其互相发明递为蜕变及大派中所含支派应时分化之迹，易于说明。各派对于具体问题所主张，亦易于比较。其短处，在时代隔断。例如先述儒家，次述道家，则与孔子时代相次之老子，须于荀卿、董仲舒……诸人叙毕乃能论及，对于思想进化次第，难以说明。又各派末流

相互影响甚多，归类难以正确。又数大派之外，其有独立思想而势力较微者，容易漏略。

以上三法，各有短长，好学深思之士，任取一法为研究标准，皆可以成一有价值之名著也。

政治思想与其他思想之关系，兹更当一言。第一，凡伟大之学者必有其哲学上根本观念。而推演之以论政治，故欲研究先秦各派之政治思想，最少亦须对于彼之全体哲学，知其梗概。第二，政治与经济，原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，吾国夙崇“政在养民”之训，政论及政策，尤集中于人民生计。故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，实应融洽一炉以从事研究。第三，政治思想之深入国民意识中者，恒结晶为法律及制度，而政治之活力，常使晶体的法制生动摇。故两者相互之机括，又治斯学者所最宜注意也。

复次，论研究者所当持之态度，科学所以成立，全恃客观的研究精神。社会科学比诸自然科学完成较晚者，因社会事项，最易惹起吾人主观的爱憎，一为情感所蔽，非惟批评远于正鹄，且并资料之取舍亦减其确实性也。一切社会科学皆然。而政治上理论，出入主奴之见尤甚。中国唐宋以后学者，所谓“正学异端”“纯王杂霸”“君子小人”之论嚣然，而斯学愈不可复理。吾侪既以治史为业，宜常保持极冷静的头脑，专务忠实介绍古人思想之真相，而不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，批评愈少愈妙，必不得已而用，亦仅采引申说明的态度，庶乎有当也，此其一。

国故之学，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？盖由吾侪受外来学

术之影响，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。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，映吾眼而忽莹；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，经吾手而忽整；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，旋吾脑而忽畅；质言之，则吾侪所恃之利器，实“洋货”也。坐是之故，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，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，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，艳他人之所有，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。于是尧舜禅让，即是共和；管子轨里连乡，便为自治；类此之论，人尽乐闻。平心论之，以今语释古籍，俾人易晓，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，原不足为病。又人性本不甚相远，他人所能发明者，安在吾必不能，触类比量，固亦不失为一良法。虽然，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“画我须是我”。吾侪如忠于史者，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，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，致读者起幻蔽。此在百学皆然，而在政治思想一科，更直接有“生于其心害于其政”之弊，吾侪所最宜深戒也。此其二。

此两种态度，吾能言之而不能躬践之，吾少作犯此屡矣。今虽力自振拔，而结习殊不易尽，虽然，愿吾同学勿吾效也。

今当言吾书之范围，依吾之理想，欲著一部真有价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，总须将前文所举四类资料全部分贯穴熔铸之，费两三年精力，成一三四十万言以上之著作，庶几有当。今在此与诸君仅为三个月的讲习，讲义随编随发，势不能作此大举。故将第三类资料殆完全抛弃，第二第四类仅撷要作补助，而专集中精力于第一类资料。坐是之故，虽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，实则叙述先秦思想什居其七。严格论之，实当名为先秦政治思想

史。其涉及汉唐以后者，不过附庸余论。所以然者，以思想家的资格创造思想，惟先秦诸哲独擅其能，故根据第一类资料以著书，入汉遂暗然无色。史实如此，末如之何也。然此不足为完书，自不待言，吾冀他日或有力续成之，吾尤望吾同学中倘有人全部改作之。

前所列三种研究法，本书第二时代的第三宗派的两种并用。全书大略以时代为次，惟春秋战国间各国学派壁垒鲜明，为欲表出各派特色故，对于儒墨道法四家以派别相从，其不名一家者则附于后焉。第一种问题的方法与本书范围不宜，故不用。惟问题之重要而有趣者，时或为简单的贯串叙述，附录各章节之末。

附言：本书讲述伊始，其组织计划本如右，嗣以时间不敷且复婴病，故将汉以后全部阁舍，并改正其名曰先秦政治思想史矣。此文不复改正，以存经过之迹云尔。

12 年 1 月再版自记

前 论

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研究资料

我国政治思想，自孔、老、墨三圣以后，始画然标出有系统的主张，成为一家言。前此则断片的而已。虽然，后起的学说，必有所凭藉然后能发挥光大，故欲知思想渊源，非溯诸三圣以前不可。本章所叙述者，起唐虞以迄春秋中叶。此时代又当大别为三期。

第一，部落期：唐虞迄殷末约千余年。

第二，封建期：西周约三百年。

第三，霸政期，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约二百年。

第一期，部落分立。大部落之首长谓之元后，小者谓之群后。元后或称帝或称王，其实与群后地丑德齐，不过名义上认为共主。每部落人数似甚少，其生活似甚简单，其智识似未脱